

澳门各藏书系统汉文古籍的特色

邓 骏 捷

自16世纪葡萄牙人踏足澳门伊始,澳门就成为了中西文化融汇的前沿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从而形成了多元兼包的文化性格。澳门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图书文献,至今还存藏着不少珍贵的古籍图书,汉文典籍与西洋文献共同构成了丰富多采、别具特色的澳门文献和藏书宝库。古籍图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在总结智慧、承传文明的同时,更加发挥着维持民族自信心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澳门的汉文文献与古籍藏书是连系澳门与祖国的文化纽带,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在澳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与异质文明共生共存,融汇发展。

澳门文献的数量庞大,形态多样,藏地分散,收集整理以及研究的难度很大。庆幸的是,近20年来随着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拓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至于澳门汉文古籍藏书的调查整理和开发利用,目前除了何东图书馆和澳门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展了初步工作以外,其他大部分古籍藏书还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亟待全面的访查整理和刊布利用,以及改善其保护条件。

澳门的古籍藏书系统与中国古代藏书系统大体一致,基本上是四分天下的格局,即政府的公共藏书、学校的学术藏书、教堂寺庙的宗教藏书、私人的鉴赏藏书。由于各种原因,私人藏书目前还很难掌握其具体情况,但随着近年个别藏书家慷慨地将藏书捐赠予公共图书馆,部分私人藏书已经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其中特出的例子有(1)1982年何贤先生(1908-1983)从汪宗衍先生(1908-1993)处购入其父近代岭南学者汪兆镛(1861-1939)及其本人的一批家藏古籍,并转赠予东亚大学(澳门大学前身),计约360余种,3,000余册。(2)2002年刘羨冰女士将一批家藏古籍和平装书捐赠予澳门中央图书馆,合计208册^②。(3)吴利勋先生先后多次将家藏的古籍图书及书画文物捐赠予澳

①参见赵春晨:《澳门历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刊布和利用》,《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第112-117页。

②有关刘羨冰女士赠书的情况,详见《刘羨冰女士赠书目录》,澳门中央图书馆,2002年。

门博物馆和澳门大学图书馆。(4)陈炜恒先生(1962-2007)病逝后,家属依照其遗愿将家藏的400余种古籍图书,共1,200余册,悉数捐赠予澳门大学图书馆。本文主要探讨前三大系统的古籍藏书特色,并注意论及其中的私人捐赠。

一、政府公藏古籍

澳门政府公共图书馆的汉文古籍主要存藏于澳门中央图书馆辖下的何东图书馆^①。何东图书馆所藏的古籍图书以近代著名藏书家刘承幹(1881-1963)的“嘉业堂”旧藏16种最为珍贵,此批古籍原为澳门葡萄牙人白乐嘉(José Maria Braga, 1897-1988)所有,于1958年转售予何东图书馆,以下为“嘉业堂”旧藏16种古籍的简目^②。

编号	书 名	卷数册数	编著者	版 本	批校题跋
1	资治通鉴大事录	144 卷 48 册	(清)李祖陶辑并评点	清稿本 ^③	
2	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篇	50 卷 40 册	(清)张星曜编	清稿本	
3	中兴纲目	10 卷 10 册	(清)徐树丕辑	清抄本	
4	皇明大政记	36 卷 18 册	(明)雷礼辑	明抄本	
5	圣政记	10 卷 10 册		明抄本	
6	皇明大政记	36 卷 33 册	(明)朱国祯辑	明崇祯《皇明史概》本	
7	皇明大训记	16 卷 16 册	(明)朱国祯辑	明崇祯《皇明史概》本	(清)钱谦益批校
8	皇明大事记	50 卷 47 册	(明)朱国祯辑	明崇祯《皇明史概》本	(清)钱谦益批校
9	三朝要典	24 卷原始 1 卷 22 册	(明)顾秉谦、徐绍言等纂修	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	
10	罪惟录	90 卷 100 册	(清)查继佐撰	清稿本	
11	江南野史	10 卷 4 册	(宋)龙衮撰	清抄本	(清)赵辑宁跋
12	雍大记	36 卷 20 册	(明)何景明撰	明嘉靖刻本	(清)杨自牧跋

①澳门中央图书馆辖下另有民政总署大楼图书馆,内藏有17至20世纪中叶的外文古籍,特别是葡萄牙在非洲及远东活动的历史文献,约有19,000余册。

②本简目根据《何东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展览目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中央图书馆,2000年)以及笔者对此批古籍的认识综合整理而成。

③此本《何东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展览目录》著录为“稿本”,准确地说应为誊清稿本,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同样将江西省上高县图书馆所藏的《资治通鉴大事录》(存八十一卷[一至十八、二十二至四十九、五十三至七十七、八十六至九十九])著录为“稿本”。两者关系如何,尚待进一步查考。

(续表)

编号	书 名	卷数册数	编著者	版 本	批校题跋
13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	不分卷 150 册	(清)翁方纲撰	稿本	
14	程史	存卷 1 至卷 3, 合 1 册	(宋)岳珂撰	清文澜阁《四库全书》本	
15	太平御览	原 1,000 卷 100 册(缺卷 741 至卷 750,合 1 册)	(宋)李昉等撰	明抄本	(清)缪荃孙校, (清)费念慈跋
16	国朝典故六十二种	110 卷 32 册	(明)朱当泗编	明抄本	

这 16 种古籍中,以《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罪惟录》、《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篇》等稿本和清稿本最为珍贵^①。《圣政记》以编年体纪录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一朝之事,《嘉业堂藏书志》谓此书不同于明宋濂所撰的《洪武圣政记》^②,或疑是抄书者裁头去尾,改头换面所为。其他如《皇明大政记》、《中兴纲目》、《江南野史》、《太平御览》、《国朝典故》、《程史》等抄本,今虽另存抄本或刻本,但仍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③。《雍大记》、《三朝要典》、《皇明大政记》、《皇明大训记》、《皇明大事记》(以上三书均为清禁书)等虽非人间孤本,亦是较为罕见之物。

何东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也有不少澳门地方文献,方志史料类有清暴煜修《香山县志》(乾隆刻本)、清祝淮修《香山县志》(道光七年(1827)刻本)、厉式金修《香山县志续编》(民国十二年(1923)刻本)、《镜湖医院壬戌徵信录》(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等,居澳寓澳名人著作有清屈大均撰《翁山文外》(民国年间《嘉业堂丛书》本)、郑观应撰《盛世危言后编》(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等。

何东图书馆还藏有大量清末民初的蒙学著作、新式教科书,以及汉洋合璧的汉语教科书。其中属于近代改良主义教育家陈子褒(1862-1922)及其澳门荷兰园蒙学书塾编印的白话蒙学教材就有《三次改良妇孺论说两种》(即《妇

①由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是《四库全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文献,有极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为了让世人一睹其面貌,澳门中央图书馆将其交付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先生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整理,于 2000 年出版线装影印本两函十八册。因为原稿散乱,识读非易,复请上海复旦大学吴格教授标校,于 2005 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整理本。

②参见《何东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展览目录》,第 6 页。

③如《皇明大政记》虽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博古堂刻二十五卷本,但此三十六卷本的抄写流传当早于刻本,参见《何东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展览目录》,第 4 页。又如《太平御览》有缪荃孙(1844-1919)的校语,今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著录有缪氏所校《太平御览》,可见此本中的缪氏校语甚具价值。

孺论说入门》)、《妇孺八劝》、《妇孺信札材料》、《妇孺浅解》、《妇孺须知》、《妇孺新读本》、《妇孺论说两种》等,这批蒙学著作是澳门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此外,尚有《大德国学校论略》(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教化议》(光绪元年(1875)刻本)等西方传教士的教育改革著作,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春季始业新国文》、《高等小学新算术》、上海中华书局的《新式国文教科书》等近代新式教科书。汉洋合璧汉语教科书则有中葡对照的《公馥琐谈》(光绪十六年(1890)铅印本),中英对照的《增广英语撮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铅印本)等。

澳门著名教育工作者、澳门中华教育会副会长刘羨冰女士于2002年捐赠予澳门中央图书馆的古籍和平装书中亦有近百册清代至近代的翻译教科书、蒙学著作和新式教科书。如清代光绪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刻印的外国军事教科书《行军测绘》、《兵船汽机》、《汽机发轫》等,清末民初的传统蒙学著作刻本有《四书白话旁训》、《新增诗经补注附考备旨》、《礼记备旨全文》、《女孝经》等,清末民初的新式教科书有《中学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生理卫生教科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因此,清末民初的蒙学著作、新式教科书、汉洋合璧汉语教科书等近代教育文献成为澳门公共图书馆古籍藏书系统中的一大特色。

此外,何东图书馆更有不少西方传教士的宗教著作,如《圣经》汉译本便有《旧新约全书》(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新约全书》(光绪三十年(1904)铅印本)、《新约圣经译注》(民国二年(1913)铅印本),其他宣传教义教理的有《天路历程》(同治九年(1870)至十年(1871)刻本)、《指明天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晓初训道》(光绪二年(1876)刻本)、《人灵战纪》(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述史浅译》(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辜苏历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等,其中《旧新约全书》、《天路历程》、《指明天路》、《晓初训道》、《人灵战纪》皆以粤方言写成,明显是针对广东地区传教工作而编写的著作。

澳门政府公共藏书系统中除澳门中央图书馆以外,澳门博物馆也有不少古籍图书^①。澳门著名实业家、澳门收藏家协会会长吴利勋先生曾多次将家藏的古籍图书、名人书画以及文物等捐赠予澳门博物馆,其中包括世居澳门的赵氏家族的古籍文物,如《赵书泽堂家谱》、赵氏书画作品等^②。

二、学校所藏古籍

澳门学校的古籍藏书以澳门大学最为丰富,澳大图书馆现藏有汉文古籍7,000余种,13,000余册,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刻本、套印本、抄本、批校本等,内

^①据知澳门博物馆就藏有属于屈大均、郑观应等人著作的古籍图书。

^②参见吴利勋主编:《澳门历史文物艺术展》,澳门收藏家协会、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7年。

有大量岭南以及澳门的地方文献和西洋宗教类图书,颇具特色^①。澳大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主要来源于社会人士的捐赠,购买只占少数^②。

古籍中的善本,向来以其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为世人所重,澳大图书馆所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刻本、抄本及具有特色的批校本、套印本共70余种,大多数是汪氏父子的家藏旧物,也有属于陈炜恒先生的旧藏。明刻本中较为珍贵的有宋刘恕撰、宋史照音释、明王逢辑义、明刘刻增校、明刘弘毅补注《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弘治正德间刘氏慎独斋刻本),宋姚铉辑《重校正唐文粹》(嘉靖刻本),明陆深撰《俨山外集》(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1546-1551)陆楫刻本),明王廷相撰《王氏家藏集》(嘉靖刻本),明王世贞辑《尺牍清裁》(隆庆五年(1571)王世懋写刻本),明薛应旂撰《宪章录》(万历二年(1574)陆光宅刻本,清禁书),汉刘向撰《说苑》(万历中程荣刻《汉魏丛书》本),宋宗泽撰、明张维枢选《宗忠简公文集》(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万历商濬刻《稗海》本),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明末刻本),等等。

清刻本中较为珍贵的有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文选》(清初汲古阁本),清钱谦益注《杜工部集》(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静思堂刻本,清禁书),清潘高撰《南邨诗稿》(康熙十九年(1680)鹤江草堂刻本),宋陆游撰、清杨大鹤选《剑南诗钞》(康熙二十四年(1685)杨大鹤刻本),清钱谦益撰《钱牧斋先生尺牍》(康熙三十八年(1699)顾氏如月楼写刻本,清禁书),陈徐陵辑《玉台新咏》(康熙五十三年(1714)砚丰斋写刻本),清朱彝尊辑、汪森等评《明诗综》(康熙刻雍正朱氏六峰阁印本,清禁书),清郝玉麟等修、鲁曾煜等纂《广东通志》(雍正九年(1731)刻本),明区大相撰《区太史文集》(雍正刻本),清翁方纲撰《粤东金石略》(乾隆三十六年(1771)石洲草堂刻本),清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县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明汤显祖撰、清叶堂订谱《紫钗记全谱》、《南柯记全谱》(乾隆五十九年(1792)叶氏纳书楹刻本),清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乾隆刻本),以及清黄景仁撰《竹眠词钞》(吴兰修校抄本),宋田锡撰《咸平集》(清抄本),等等。

汪兆镛、汪宗衍父子两人均为近现代著名的粤籍学者,尤长于岭南文史、乡邦文献以及澳门历史的研究。关于岭南文史方面的著作,汪兆镛有《元广东遗民录》、《广州城残砖录》、《广州新出土隋碑三种考》、《岭南画徵略》、《澳门杂诗》等,又曾参与《番禺县续志》的编纂,汪宗衍有《清末中英虎门事件题稿考证》、《天然和尚年谱·天然和尚著述考》、《屈翁山先生年谱》、《陈东塾

^①详参邓骏捷主编:《澳门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图录》,澳门大学,2006年。

^②除上文提到的何贤先生、陈炜恒先生以及吴利勋先生的捐赠之外,1985年香港大学陈君葆教授(号水云楼主,1898-1982)的遗孀将家藏古书捐赠予香港大学,后来经澳大图书馆前任馆长林佐瀚先生(1934-2001)的奔走,结果由香港大学先挑取部分珍藏,其余全部转赠予当时的东亚大学图书馆,计约4,500余种,6,500余册。

先生年谱》、《陈东塾先生诗词》、《广东书画徵献录》、《广东文物丛谈》等,出于研究著述的需要和浓厚的桑梓之情,汪氏父子对于岭南文献的搜集和保存不遗余力。陈炜恒先生生前致力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著有《澳门庙宇》、《莲峰庙史乘》、《路氹掌故》等,藏书中有大量的澳门文献,供其写作研究之用。再加上馆方也十分注意对澳门古籍文献的购藏,因此岭南文献以及澳门文献的典藏成为了澳大图书馆古籍藏书的一大特色。

澳大图书馆所藏岭南以及澳门地方文献以方志、史籍为主,其中较为珍贵的有30多种,如清郝玉麟等修、鲁曾煜等纂《广东通志》(雍正九年(1731)刻本),清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县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清彭人杰等修、黄时沛等纂《东莞县志》(嘉庆四年(1799)刻本),清洪先焘纂修《大埔县志》(清嘉庆九年(1804)刻本),清郭汝诚、冯奉初纂《顺德县志》(咸丰三年至六年(1853-1856)刻本),清郑梦玉修、梁绍猷等纂《南海县续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清卢蔚猷修、吴道镕纂《海阳县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潮城谢存文馆刻本),清梁鼎芬修、丁仁长等纂《番禺县续志》(宣统三年(1911)刻本),以及清仇池石辑《羊城古钞》(嘉庆十一年(1806)大赉堂刻本),清邓淳辑《岭南丛述》(道光十年(1830)养拙山房刻本),清刘子秀辑《西樵游览记》(道光十二年(1832)黄亨补刻本)等。

其次为明清至近代时期岭南以及澳门文人学者的著作,以诗文集为主,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宋余靖撰《武溪集》(嘉庆十八年(1813)文林堂重刻本),明黎贞撰《重刻林坡先生集》(清刻本),明李时行撰《李驾部集》(清刻本),明区大相撰《区太史文集》(雍正刻本),明韩上桂撰、清韩远鹄辑《韩节愍公遗稿》(嘉庆二十一年(1816)羊城朵云山房刻本),明释函昱撰、清释今球编《瞎堂诗集》(清刻本),明释函昱等撰、清徐作霖等编《海云禅藻》(道光十年(1830)番禺陶克昌不如不来斋重刻本),清屈大均撰《道援堂诗词集》(道光刻本),清释成鹫撰《咸陟堂诗集》(道光刻本),清释今无撰《光宣台集》(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刻本),清赵希璜撰《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五年(1793-1800)安阳县署刻本),清黎简撰《五百四峰草堂诗钞》(乾隆嘉庆间众香亭刻本),清陈在谦撰《七十二峰堂文勺》(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清何彬撰《三十六洞天草堂诗存》(道光八年(1828)刻本),清许玉彬、沈世良辑《粤东词钞》(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等等。其中明末清初的释函昱、屈大均、释成鹫、释今无、陈在谦等人皆为明代遗民,其著作均列入“清禁书”范围之内,因犯禁而流传稀少,为后世藏家所重视。需要指出的是,此部分的“清禁书”为汪兆镛旧藏,这和他的遗民意识,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学术旨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①。

^①有关汪兆镛的遗民意识,详参彭海铃《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至于澳门文人学者的著作方面,有清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乾隆刻本),清郑观应撰《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光绪二十一年(1895)铅印本),冯秋雪等撰《六出集》(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以及由清陈子襄撰、光绪年间蒙学书塾刻印的《妇孺释词》等10余种白话蒙学教材。当然汪氏父子已刻印出版的著作,澳大图书馆基本上皆有存藏。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初始之地,保藏汉译西学著作成为了澳大图书馆的题中之义。目前澳大图书馆所藏此类古籍文献以清代刊行的天主教文献为主,来源主要包括馆方购自 Mr. Simão Leong 的家藏图书以及陈炜恒先生的赠书。就图书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圣经》的西方传教士译作,如佚名氏译《圣经节录》(光绪十年(1884)刻本),佚名氏译《新约圣书·使徒行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等。第二类是关于圣母、圣徒和传教事迹的作品,如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译述的《圣母行实》(嘉庆三年(1798)刻本),佚名氏撰《玫瑰经注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慈母堂铅印本),清黄伯录译《圣女斐乐默纳传》(光绪五年(1879)上海慈母堂刻本),夏显德译《观光日本》(同治十年(1871)上海慈母堂刻本)等。第三类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关于教义教理的著作,如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译《圣经直解》(清末刻本),西班牙传教士白多玛(Thomas Ortiz)撰《圣教切要》(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刻本),法国传教士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述《盛世刍蕘》(清末刻本),白多玛(Thomas Ortiz)述《四终略意》(道光十六年(1836)重刻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ano Aleni)述《涤罪正规》(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本),陆安德(Andre-Jean Lubelli)撰《善生福终正路》(咸丰二年(1852)重刻本),艾儒略述《弥撒祭义》(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本)等。

澳大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中有一定数量的清代以来著名学者、藏书家的批校题跋本,皆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其中如何焯校跋、江德量过录并跋《说苑》^①,何焯校、钱士谥校、佚名氏过录并校《文选》,王芑孙题跋、江沅校跋、辛耀文过录并跋《重校正唐文粹》,戈小莲校跋的《宗忠简公文集》,钱师璟校跋《潜研堂文集》,李文田批校《北梦琐言》,罗振玉题跋《宪章录》,陶邵学批点《两当轩全集》,汪琬批校《晁具次先生诗集》等。同时,汪宗衍先生于多种古籍上的题跋,或考证版本年代,或阐释内容特点,或探讨批校递藏情况,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古籍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如前所述,澳大图书馆馆藏古籍主要来自汪兆镛汪宗衍父子、陈君葆教授、陈炜恒先生等人的藏书,其中不少古籍流传有绪,曾经为清代以来的著名学者、藏书家所典藏。以下试就部分古籍中的藏印来说明这些藏书的流传经

^①有关此本的情况,详参邓骏捷:《清人江德量过录何焯校宋本〈说苑〉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第66-70页。

过,至于题跋所反映的典藏情况已见上文,此不赘叙。从目前初步查明的情况来看,澳大图书馆的古籍中包括有清圣祖第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之子怡亲王弘晓旧藏《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钤“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张金吾(1787-1829)、陆芝荣(1808-1830)、王荫昌、李盛铎(1859-1934)和陶湘(1870-1939)等人旧藏《咸平集》(钤“张月霄印”朱文方印、“爱日精庐藏书”朱文方印、“秘册”朱文长方印、“式间草堂图书”朱文方印、“五桥珍藏”白文方印、“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朱文长方印等)^①,莫友芝(1811-1871)旧藏《扬子法言》(钤“莫友芝图书印”朱文长方印、“莫彝孙印”朱文长印、“莫绳孙印”白文长方印),吴荣光(1773-1843)、何瑗玉旧藏《金石萃编》(钤“筠清馆印”朱文方印、“端溪何叔子瑗玉号蓬盒过眼经籍金石书画印记”朱文方印),方鼎锐旧藏《姜白石集》(钤“方氏子颖”朱文方印、“子颖平生珍赏”朱文长方印),罗天池、陈澧(1810-1882)、伍德彝(1864-1927)旧藏《留春草堂诗钞》(钤“罗氏六湖”朱文方印、“六湖”朱文长方印、“陈兰甫”白文方印、“万松园”白文长方印等),郑观应(1842-1921)旧藏《盛世危言增订新编》(钤“香山郑观应原名官应”白文方印、“罗浮黄龙观待鹤道人郑陶斋”朱文方印),梁鼎芬(1859-1919)旧藏《晁具次先生诗集》(钤“臣梁鼎芬”白文方印、“节庵藏书”朱文方印),张之铭(1872-1937以后)旧藏《瞎堂诗集》(钤“张之铭珍藏”朱文方印、“张之铭古欢室藏书印”白文长方印),张其铨(1877-1927)旧藏《王氏家藏集》(钤“无竞先生独志堂物”朱文长方印)等。此外,《重刻秣陵先生集》上钤“汪琬私印”白文方印、“谷庵”朱文方印,则此本乃汪兆镛叔父、“粤东三大家”之一的汪琬(1828-1891)的藏书;《潜研堂文集》上钤“微尚斋”朱文长方印,是汪兆镛的藏书印,同时多种古籍上钤“汪宗衍”白文方印、“汪”朱文圆印、“宗衍”白文方印。凡此等等,足以说明此批古籍确为汪氏两代人的藏书。结合批校、题跋和藏印的情况来看,澳大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多为清代以来名家的旧藏,尤以岭南学者、藏书家为主,深入考察此批藏书的流传经过和批校情况,对于研究清代藏书史(尤其是岭南藏书史)和岭南地区的学术情况不无裨益。

另一方面,由于澳门有些中学的办学历史悠久,所以一些中学的图书馆亦藏有不少汉文古籍,但目前还没有展开全面的调查,本文只能就笔者所知所见而言,并非澳门学校藏书的全面情况^②。

①李盛铎于《木犀轩藏书书录》曾云:“《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锡撰,旧抄本(清抄本)。前有苏轼序,范仲淹序,司马光撰神道碑。末附田锡所撰其父懿墓碣一首。首有‘张印月霄’、‘爱日精庐藏书’两朱文方印,又有‘秘册’朱文长方印。”所述之抄本与澳大藏本全同,则此本或曾为李盛铎所藏,至少为其所见。

②主要参考林金霞《澳门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探源》,《两岸三地古籍与地方文献(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学刊第4期)》,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2002年,第25至40页,以及笔者亲自调查所得的资料。

1. 澳门圣若瑟中学图书馆藏有线装书 4,000 多册,主要是从澳门圣若瑟修院移送过来保存的,据知内中有不少属于西方宗教图书。

2. 澳门粤华中学图书馆藏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其中经部存 375 册,史部存 201 册,子部存 236 册,集部存 681 册,共计 1,493 册。另外,还有清末民初石印本、铅印本古籍,如《徐文定公家书墨迹》、《袖珍古书读本》、《万国通史续编》、《万国通史三编》、《纲鉴易知录》等,惜多残缺不全。

3. 澳门慈幼学校图书馆藏有一套《直隶南雄州志》(残本),为清道光刻本;一套《顾氏文房小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

4. 澳门教业中学藏古籍图书约有四个书橱,主要为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刻本和铅印本,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皆有,还有一些医书,部分虫蛀破损严重,几套清末岭南作家的诗文集保存得较好^①。

三、教堂寺庙所藏古籍

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信仰于明代中期开始传入澳门,400 多年来,与其他各种宗教和谐共处。澳门作为天主教远东传教基地的同时,亦成为了西方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文献制作和保存中心。另一方面,出于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需要,来华的传教士也购买和编撰了不少汉文图书。由于绝大部分的教堂和修院(包括澳门主教府)的图书馆均不对外开放,难以展开调查工作,但据笔者了解的情况,其中不少教堂和修院就藏有大量的汉文古籍。如笔者曾参观的澳门圣若瑟修院就藏有购自澳门崇实学校的古籍,其中包括清丁易修、释成鹭纂《鼎湖山庆云寺志》(康熙刻本),清陆树芝辑注《庄子雪》(嘉庆四年(1799)刻本),《十三经注疏》(同治十年(1871)广东书局重刻武英殿本)等一批清代初期至民国时期的古籍图书,有数百种之多;又有大量的西方宗教文献,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三山论学记》(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刻本)、《性学粗述》(上海土山湾印书局民国十一年(1922)刻本)等,至少近百种。

早在葡萄牙人踏足澳门之前,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已在澳门广泛传播,并成为华人的普遍信仰,寺庙总数达 40 馀座。号称“三大古刹”的妈阁庙、普济禅院(观音堂)、莲峰庙,历史皆在三四百年以上,这些庙宇在澳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诸多历史文化大事的发生地。“三大古刹”中的普济禅院内收藏有许多名家的书画文物,其中包括清初“岭南三大大家”之一的陈恭尹(1631-1700)、清初名僧释成鹭(迹删,1637-1719)、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1869-1936)、岭南派大师高剑父(1879-1951)及其弟子关山月(1912-2000)等人的书画作品,而镇寺之宝当属明末清初高僧金堡(今释、

^①有关澳门教业中学古籍藏书的情况承曾任教于该校的上海师范大学陈年希教授惠告,谨此致谢。

澹归,1614-1680)的《澹归和尚丹霞日记》手稿本,以及被尊为普济禅院祖师的清初高僧石濂大汕(1633-1705)的自画像^①。

《澹归和尚丹霞日记》手稿本全一册,共28页,内容起自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廿九日,迄于十一月三十日,末有“今释”朱文方印、“澹归”白文方印。后有嘉庆十三年(1808)张璐题跋,丁卯年(1927)、丁丑年(1937)、戊寅年(1938)汪兆镛题记,戊寅年(1938)李仙根(1893-1943)题记,己丑年(1949)商衍鎏(1875-1963)题记,1962年汪宗衍题跋。《日记》上半部记载澹归和尚住持粤北丹霞山别传寺的活动,下半部为九月二十日到别传寺下院南雄龙护园以后的活动,记录了澹归和尚整顿别传寺、营建龙护园的过程,以及与各地高僧、遗民名士、达官贵人交往的情况,是清初岭南佛教的珍贵文献,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②。普济禅院所藏古书、字画、文物之多,堪称澳门佛教文献的宝库,可惜目前尚未全部公开。但笔者可以预言,其价值并不下于何东图书馆的“嘉业堂”16种,且多与澳门佛教史关系密切。

另外,澳门独一无二的尼姑庵“功德林”亦藏有不少佛教经书。经学者初步点算,现有藏书约5,000册,绝大部分属于佛教文献,如《大乘起信论科经》(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大乘起信论疏解汇集全函》(光绪二十四年(1899)金陵刻经处刻本)以及《杨仁山居士遗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等^③。与教堂和修院的情况相同,澳门寺庙的藏书也是不对外开放的,想了解它们很多时候真的要靠佛家所说的机缘。

作者工作单位:澳门大学中文系

①详见姜伯勤:《澳门普济禅院所藏石濂大汕自画像及大汕广南航行与重修普济禅院的关连》,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2002年春季号,第27-50页。

②《澹归和尚丹霞日记》的复印件及其史料价值,详见姜伯勤:《澳门普济禅院藏澹归金堡日记研究》,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1999年春季号,第19-36页。

③有关“功德林”所藏佛经的情况,详见杨开荆:《澳门特色文献资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83页。